

《颜氏家训》的人文关怀及现代启示

李 鹏 辉

(重庆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学院, 重庆 400043)

摘要:《颜氏家训》是我国家训里程碑式的著作。它集前代家训之大成,不仅以内容的丰富性、理论的系统性,文体的范式性,将家庭教育与社会大众化生活紧密结合,事理与亲情融合,言训与心育并用,而且在严肃的道统传承和尊长期待中包含了浓郁、细致、深远的人文关怀。在社会高速发展,教育、尤其是家庭教育从观念到内容急需与时俱进的今天,我们以应试为功利目标的学校教育,在物化倾向重荷下向空心化、概念化、教条化嬗变的家庭教育,可以从中获得一点中国特色的人文关怀的启示,使我们在面对人、教育人、塑造人的百年工程中更富有人性化、人情味,更长于情感的、心灵的沟通与感召,从而促进青少年人文心理的建构,使他们逐步成长为走向世界的当代中国人。

关键词: 颜氏家训; 人文关怀; 现代启示

中图分类号: G40—093.3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57(2005)01-0106-06

一、《颜氏家训》的人文背景

《颜氏家训》是我国家训里程碑式的著作。它集前代家训之大成,不仅以内容的丰富性、理论的系统性,文体的范式性,将家庭教育与社会大众化生活紧密结合,事理与亲情融合,言训与心育并用,而且在严肃的道统传承和尊长期待中包含了浓郁、细致、深远的人文关怀。

诞生《颜氏家训》的时代,政权更替,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人的生存环境恶化,人的发展前景严峻。即使是世家子弟,也往往因“朝市迁革”而“被褐而丧珠,失皮而露质”,致使“鹿独戎马之间,转死沟壑之际”^[1](P148)者比比皆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人应对乱世、自我生存的能力,捕捉机遇、自我发展的能力就必然成为人的素质中尤其重要的内涵。作为一个对子孙富于爱心和责任感的为人父母者,不能不将子弟们的素质教育,尤其是生存发展教育作为一项重大使命,为之殚精竭虑。

《颜氏家训》正是一个生于乱世、为宦四朝、饱经沧桑,怀抱着对人生、社会的深刻认识,对家庭、子孙

高度责任感的传统知识分子面对家庭和子孙以人生全书式的真情道白,对后代进行思想训导与心灵化育,以期实现前代尊长与后辈子孙之间家族文化遗产的自觉传递,使子孙后代上可“绍家世之业”,下可安身立命。在这部集大成的著作中,既有历代圣贤者之言,也有颜氏家族的祖风遗训,更多的是颜之推自己亲历乱世与披览群书的阅历、体察和感悟,透视着中国社会的纷纭万象、人情世故的门里婉曲,散发着中华人文文化的芬芳气息,鲜明地表现出以人为中心,以生存发展为基点,以做人为宗旨的人本主义家教风采。其人文关怀式的家教风格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仁爱、真切、细致、深远。仁爱是其人文关怀的核心,真切、细致是其人文关怀的质地,深远是其人文关怀的视野。

其实,对于《颜氏家训》的人文关怀的价值,前人早有认识。明人张璧《明嘉靖甲申傅太平刻本序》说得十分明白:“乃若书之传,以提身,以范俗,为今代人文风化之助。”^[1](P614)但对于这部分价值,历来缺乏系统的梳理整合,更缺乏在教育科学理念引领下的研究探讨。

收稿日期: 2004-11-02

作者简介: 李鹏辉(1949—),男,四川南溪人,重庆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副教授。

今天，素质教育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但是学校教育大体依旧是一种强化型的应试机制，家庭教育物质优化、人文淡化的倾向并没得以改观。在以考试、升学、就业为目标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教育模式中，由于人文缺失致使受教育者的心灵、精神遭受极大的损伤。人文关怀，正是弥补这一缺失、理疗这一损伤的重要途径。因此，研究、探求《颜氏家训》的人文关怀内涵，借鉴曾经滋养了成千上万中华杰出人物的中国特色的人文关怀传统，有助于中国的教育工作者、为人父母者增强人文关怀的意识，提高人文关怀的艺术，以改变学校教育、家庭教育质量，从而培养青少年良好的人文心理，提升青少年的人文素养，以促进青少年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

二、《颜氏家训》人文关怀的文本体现

(一)对生命和人性的充分尊重。颜之推的生命价值观是一个“保身、养生”的垂直架构。相关内容主要集中在《养生篇》。

首先，他承认生命的惟一性，“性命在天，或难钟值”，因此，“夫生不可不惜”。出于这样的前提，他提出人必须保身、养生的命题。保身是尊重生命的存在，是养生的前提，“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后养之，无徒养其无生也。”[1] (P356—362)对于保身的原则，他特别强调了社会的因素，那就是“先须虑祸”。这里所谓的祸，是指因自身的修养与德行而造成的祸患。他以例释之，“岩居水饮，不与民共利”的单豹，虽七十高寿却死于饿虎，是不合群而导致的祸患；张毅人际关系很好却四十而病故，是不善养生而导致的祸患；嵇康深得养生之道，却因性格孤傲，不容于权贵，而导致杀身之祸，是明哲而不善保身的典型；石崇因贪婪溺财而导致祸患，是积财者不善积德的典型。在这些典型举例中，表现出作者对人世祸患的归因思考，那就是德与祸的反正关系。这里所谓的“德”应当是一个广义的人格修养的概念，既包含了品格的自我修养，也论及到人际关系的协调能力，还涉及到健康与生命、人事与天命的和谐关系。作者从上述典型教训中充分意识到修身养德与保身的因果关联。出于尊重生命的原则，他对于世俗贱视女婴，甚至“贼行骨肉”的行为，表示不忍与不平：“天生蒸民，先人传体，其如何哉！”[1] (P51)

养生是对生命的呵护。他告诉子弟们养生必须要有正确的方法。要注重合理有度的饮食起居，“慎节起卧，禁适寒暄”，并注意心理健康与养生的关系：“爱养神明”。他赞同药物保健，“诸药饵法不废世务也”，但又告诫说，“但须精审，不可轻脱”。他质疑时

下盛行的道家养生学说的虚妄，明示子孙不取。应当强调的是，他的“保身”有鲜明的价值原则。“夫生不可不惜，但不可苟惜。”对于“涉险畏之途，干祸难之事，贪欲以伤身，谗慝而致死”之类，君子自然惜其生。但是，对于“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国”之类，君子是不足惜的。[1] (P356—363)关于这一点，不少人通常会指责颜之推“一生而三化”却大谈“泯躯而济国”的高论，言行相悖。其实，颜氏“三为亡国之人”和写作《颜氏家训》面临的是完全不同的对象与背景。身在乱世，他所面对的是复杂的世界，尤其是在人生的重大抉择面前，多种因素错综交互，对很多问题他可能无法驾驭，他的抉择可能是违心的，言不由衷、行不由衷。而当他面临自己的子孙时，这种关系就变得真纯得多，“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1] (P1)。尤其是在他做出违心的抉择之后，痛定思痛，出自对子孙后人的责任与赤诚，由衷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讲真话、实话，这种欲望就会十分强烈。因此，无论对其“一生三化”的行为应做何评价，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颜之推在本书所表达的关于“保身”的价值原则应当是他的肺腑之言，真实而可信。

(二)以安身立命为宗旨的道德修养与为人处世观。安身立命是中国哲学的基本命题之一，安身立命的途径就是每一个“个体”将自己纳入社会群体之中，按照群体规则(伦理原则)与这个群体或群体规则保持一种“和合性”[2] (P391)。

颜之推从保身的立场出发，强调保身“先须虑祸”，虑祸则须修德，这是安身立命的前提。因此，他在《风操篇》中不厌其烦、连篇累牍、极致琐细、深入浅出地向子弟们传授道德修养与处世为人的个中道理，其目的是为了让子弟们通过内心的自我完善以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他推崇房文烈、裴子野待人的宽仁笃厚，贬斥邺下将军的贪婪刻薄和南阳富翁不近人情的吝啬，并以他们的可悲下场告诫子弟引以为戒。他教导子弟在社会交际中要注重礼节、礼貌。要待客以礼、待客以诚；要辨明礼俗，待人接物乃至称呼用语都要合礼、得体；参与亲朋的红白喜事要真诚、适时；要注重亲情关怀与表达，无论亲人临战、还是临危都要给予心灵抚慰，休戚与共，但对于不同个性的人，在表达情感的形式上不要一概而论；语言要文明、慎重，不要以伤害别人来取悦自己；结交社会朋友，要注重志趣与节义相投、始终如一；青少年选择社交圈子，要注重“与善人居”，讲求“但优于我，足贵之”的原则；在名利问题上，要洁身自好，“窃人之财，刑辟之所处；窃人之美，鬼神之所责”

[1] (P59—126)。这些贴近社会生活实际、周全精到、无微不至的谆谆之教，体现了颜之推慈父严师式的人文关怀风范。

(三)切近社会生活实际的劝学箴言。传统劝学注重晓之以事理(如荀子《劝学》)、晓之以名利(如汪洙《神童诗》),《颜氏家训》则从人的社会化生存需要出发缘世而循理,因世而见利,因而更具人性化、人情味、生活化、经验化。具体而言,《颜氏家训》注重以下几个方面切入:

(1)学习是社会化生存的需要。出于自己离乱的人生经历,他感慨发生在自己身边诸多贵族子弟盛世“望若神仙”,乱世“泊若穷流”的人生变幻。他沉痛指出这是因为他们“不学无术”所造成的。一旦失势,自然“求诸身无所得,施之世而无所用”。为此,他谆谆告诫说:“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能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当自求诸身耳。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对于求诸自身的途径,他首推的是读书明经:“明六经之指,涉百家之书,纵不能增益德行,敦厉风俗,犹为一艺,得以自资。”[1] (P148—157)显然,这是从封建知识分子进可以入朝为仕,退可以开馆授业的人生选择来考虑的。这样的考虑,也反映了颜之推对待子孙前途进退裕如的宽松心态和现实主义的入世态度。

(2)学习是优化生活品质的需要。按照颜之推的大学习观,被他归入“杂艺”的艺术类也具有养生的作用,在学习中不可偏废。但对于艺术的价值和功能却有他自己的见解。对于书法,他认为“微须留意”,因为它可以传达自己的精神面貌,正如谚语所说“尺牍书疏,千里面目”;对于绘画,他认为“玩赏古今,特为宝贵”;对于琴瑟,他感叹“愔愔雅致,有深味哉”,“足以畅神情也”;对于博弈,他认为“有时疲倦,则倘为之,犹胜饱食昏睡,兀然端坐耳”;他评价围棋“颇为雅戏”,评价弹棋“亦近世雅戏,消愁释愤,时可为之”。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颜之推从优化生活品质(养生)的角度出发,看到了艺术的娱情乐心、消遣休闲的价值作用。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他不主张学艺过精,涉入太深。这是因为学艺过精,技艺超群,难免身不由己,为贵族官僚所驱使,“巧者劳而智者忧,常为人所役使,更觉为累”。如果这样,就违背了学艺以提高生活品质的原则,反受其累。但是,他却主张具备高超的艺术鉴赏力,比如在书法方面他自诩“幼承门业,加性爱重,习玩功夫颇至”。

[1] (P567—590)

(3)学习是提升自我素质,增长社会实践能力的需要。颜之推认为,学习的根本目的是“开心明目,

利于行耳”。“开心明目”是提升个人素质,“利于行”是增强社会实践能力。他批评了当时读书人浮华不实,学不致用,忽略真才实学的不良学习风气:“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无闻,仁义不足”、“断一条讼,不必得其理;宰千户县,不必理其民;问其造屋,不必楣横而檼竖也;问其为田,不必知稼早而黍迟也;吟啸谈谑,咏讽辞赋,事既悠闲,材增迂诞,军国经纶,略无施用,故为武人俗吏嗤诋。”他提倡读书学习应针对社会实际,提高个人素养,解决实际问题:“不知养亲者”,通过学习古人的行孝之道,“惕然慚惰,起而行之”;“素骄奢者”,通过学习古人的恭俭节用,“卑以自牧”,“敛容抑志也”;“素怯懦者”通过学习古人的达生委命,“勃然奋起,不可恐懦也”。在颜之推看来,学习有务虚与务实两大好处,“古之学者为己,以补不足”;“今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前者的“为己”,是学习的务虚之功,目标是弥补自身在素养上、认知上的不足。后者的“为人”,是学习的务实之用,求的是利国利民之行。因此,他形象地比喻说:“学者犹种树也,春玩其华,秋登其实;讲论文章,春华也,修身利行,秋实也。”[1] (P143—236)

(4)学习是人的一生自幼及老的需要。他认为,对不同年龄的不同人群,学习的需要是共同的。“人生小幼,精神专利”,“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在他看来,应当不失时机地对儿童进行早期教育。这是因为儿童思想单纯,可塑性强,对事物反应敏锐。但他又针对个人经历的差异,勉励那些因“人生坎𡆉”而盛年失学的人,“犹当晚学,不可自弃”。他既勉励少年学子,又赞美晚年学者,认为“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1] (P172—173)。这种针对不同年龄、不同经历者的勉学之言,充满人性关怀,闪耀着人文思想的光芒。

颜之推还提倡广义的学习观。他认为学习的前提是社会化生存“从业”的必然需要:“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各种行业都须要学习,农夫“计量稼耕”,商贾“讨论货贿”,工匠“致精器用”,艺人“沉思法术”,军人“惯习弓马”,文人“讲议经书”,莫不如此。他不仅提倡精于业内的深度学习,还提倡博取各业的广度学习。因此,他嘲笑那些迂腐庸俗的读书人“不涉群书,经纬之外,义疏而已”的孤陋乏味[1] (P18);批评士大夫耻涉农商;慨叹差务工伎不懂书本知识,以至于“饱食醉酒,忽忽无事,以此销日,以此终年”;遗憾“因家世余绪,得一阶半级”者,不学无术,或遇大事“蒙然张口,如坐云雾”的无能和在高雅的社交场合“默然低头,欠伸而已”的羞耻。他进一步提出了不问贵贱,广学博取的观点:“农商工贾,厮役奴隶,

钓鱼屠肉，饭牛牧羊，皆有先达，可为师表，博学求之，无不利于事也。”[1] (P158)这一观点，可视为后来韩愈《师说》一文中“师之所存，道之所存”的先声。

通过以上对《颜氏家训》有关劝学的内涵分析，可以看出，颜之推的学习观与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学习观，无论是出发点，还是目标上既是一种承续，又是一种延伸、推广与细化。他把一种传统的理论植入社会生活的土壤，以自己对子孙后代的关爱之情与人生的阅历之智倾心培育，使之具有更加鲜活的生命力。

(四)生存艺术的传递。颜之推生活在朝不虑夕、荣辱无常的动乱时代，出自于“保身”的生命原则，自然十分重视向子孙传递生存之道。体现了《颜氏家训》最富于人性化、社会化的人文关怀旨趣。颜之推宦海沉浮与人生历练数十年，无论是处世之术，还是为官之道，他都颇有心得。对于处世，他秉承不争与平安的原则，认为天不使人完美，因此，人的识见宜广但才具不宜太冒尖。他认为那些拼命追求出人头地者“虽取贵一时，然为执政所患”，最终会后悔莫及。他尤其看不起那种踩着别人肩膀获利或通过旁门左道方式得官的人，认为他们是“盗食致饱，窃衣取暖”[1] (P327—334)。对于为宦，他更是明确给子弟划定原则：“仕宦称泰，不过处在中品，前望五十人，后顾五十人，足以免耻辱，无倾危也。”[1] (P347)对于屡屡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因托风云，侥幸富贵，旦执机权，夜填坑谷”的人间悲剧，他一再告诫子弟们“慎之哉！慎之哉！”他总结自己由南至北的官宦经历，自信“未尝一言与时人论身份”的平和不争的为官之道，“不能通达，亦无尤也”。看来，在“仕途通达”与人生平安之间，他选择的是后者。这种处世不争、甘居中游的处世原则，是儒家中庸哲学在社会生存领域的体现。需要辨明的是，颜氏这些观点，旨在向子弟们传达一种处世的艺术，并非无所作为的人生观。而且，这种以平安为宗旨的不争之道，是有原则性的，“肠不可冷，腹不可热，当以仁义为节文尔”[1] (P336—338)。这种以大义为前提的现实的柔性生存之道与历代很多名宦高士先为聪明之误，后至愚鲁之叹的人生悲剧相比显得更为成熟练达。这对于生活在文化类型多元化、生存方式多样化、人生价值多层化的现代社会人群来说，是有借鉴意义的。

(五)务实可行的人生价值阐释。颜之推推崇务实的人生价值原则，这使《颜氏家训》的人文关怀具有现实主义的价值重心。他认为人生处世的意义“贵能有益于物耳”[1] (P315)，即便是读圣人之书，也不能脱离社会死读书，“但明练经文，粗通注疏，常使

言行有得，亦足为人。”[1] (P177)他鞭挞那些尸位素餐、无所作为的庸吏；谴责那种“高谈虚论，左琴右书”者是“费人君禄位也”；他批评当世的文学之士缺乏社会实践的历练，“难可以应世经务也”；他将国家有用的人才分为六种：朝廷之臣、文史之臣、军旅之臣、藩屏之臣、使命之臣、兴造之臣，在对这六种“国之用材”的职能描述中，可以看出，这些人才对国家、社会、人民都有着不可替代的切实可用的才能与精明干练的务实风范[1] (P18, 315—317)。

(六)人性化家政观。对于齐家之道，颜之推强调中庸、亲和的原则[3] (P274)。他告诫子弟，家产只能满足生活需要，“堂室才避风雨，车马仅代杖策，蓄钱数万，以拟吉凶急速，不啻此者，以义散之；不至此者，勿非道取之。”如果不知止足，即使富拥四海的天子“犹自败累，况士庶乎？”[1] (P345)他注重家庭关系的和睦，认为父子之间要慈严结合[1] (P15)；他勉励子弟兄弟情深，不可改变；他关注妯娌纷争，认为只要心地宽厚，视对方子女为自己子女，问题就可以解决[1] (P23—28)；对于二度组合的家庭，他告诫子弟要慎重、平等对待双方的子女，如果宠爱异姓之子，就会导致子女们的抱怨，虐待前妻之子，必然引起兄弟间的仇恨，“皆门户之祸也”[1] (P37)；针对世俗常见的宠婿虐媳偏颇现象，他告诫子弟“家中常弊，可不诫哉！”[1] (P40)。可见，中庸亲和的治家原则，最终是为了维护家族安定、平衡的生活秩序，是为了保证每一个家庭成员生存利益的需要。

对子女的爱，这是中国家庭无以超脱的传统话题，但颜之推突破世俗感性之爱的藩篱，强调理性之爱。他倡导平等的爱子之心，主张“均爱”，反对偏爱：“贤俊者自可赏爱，顽鲁者亦当矜怜。有偏充者，虽欲以厚之，更所以祸之。”[1] (P8)这对我们今天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中正确对待不同状态的学生，摆正对待问题少年的态度是有借鉴意义的。

颜之推认为对子女的教化应当始自生命之初，他欣赏古代圣王胎教之法以及生小孩提即由师保导习的传统。他认为，普通家庭即便作不到圣王之教，也应当在孩子“识人颜色，知人息怒”的时候“便加教诲”。他特别强调子女教育的方法。他分析了世间溺爱失教的过程：“饮食运为，恣其所欲，宜戒翻奖，宜诃翻笑，至有识知，谓法当尔。骄慢已习，方复制之，捶楚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有爱无教的恶果：“逮于成长，终为败德”[1] (P15)。

颜之推推崇施而不奢、俭而不吝的家庭消费观。对于后者，他特别强调了“可俭而不可吝”，并解释了

“俭”与“吝”的区别：“俭者，省约为礼之谓也；吝者，穷急不恤之谓也。”[1] (P42)可以看出，他用社会的礼仪需要为准则来确立节俭标准，以能否体恤、帮助他人的穷急之难作为辨别吝啬的前提。充分体现了他守礼和以仁爱为核心的人文关怀原则。

(七)以血缘关系与世家文脉营造家庭教化的人文氛围。血缘关系是构成家(家族)的基本条件，因此，中国人文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血缘文化。[4] (P23)这决定了中国家教传统以血缘本位为出发点，以情感机制为传导手段的人文文化倾向。这种倾向在《颜氏家训》中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注重血缘关系的秩序建构。颜之推看重以血缘为本位的亲情缔造。他认为家族亲情，以父母(夫妇)、父子、兄弟三亲为根本，所谓“九族”不过是以三亲为本的推演。因此，他特别嘱咐子弟对这种“于人伦为重”的“三亲”“不可不笃”[1] (P23)。他强调庄重严肃的父子关系，“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1] (P15)显然是以父慈子孝的家庭伦理关系为出发点。他勉励子弟们要看重兄弟之情，“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后裾，食则同案，衣则傅服，学者系则同业，游则同方”，是“不能不相爱也”。即便是各自安家后，感情各有所专，也应当“惟友悌深至，不为旁人之所移也”[1] (P23)。

推崇世家荣誉与文脉的熏陶与传承。封建社会世家门族风气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登峰造极。这种观念反映在文化上就是注重家族学术的传承。[5] (P167—173)生活在这一时期，家学渊源、代有名德的颜之推必然推重世家荣誉对子孙后代的“庇荫”作用：“祖考之嘉名美誉，亦子孙之冕服墙宇也，自古及今，获其庇荫者众也。”[1] (P313)为此，他念念不忘父亲的操行与事迹“见于《梁史文士传》和孝元《怀旧志》”[1] (P269—270)，推重之意，溢于言表。他强调世家文脉的传承。一方面，他标榜“学达君子”，“相承行之”而形成的士大夫风操，另一方面，他又推崇因“家门颇有不同”、各自家门“所见互有长短”而形成的家教门风。他认为世家文脉、门风对子弟的作用和影响，正如“蓬生麻中，不劳翰墨”[1] (P59)而自直一样，可以起到潜移默化，从根本上解决的作用。他自诩家世文章“甚为典正，不从流俗”[1] (P269)的高雅风范，对于颜氏祖训，他更是“终身服膺，以为明言”[1] (P343)。对于子弟的文章习作，他强调必须“先谋亲友，得其评裁，知可施行，然后出手”[1] (P257)。他念念不忘的，是自幼蒙受的“素为整密”[1] (P4)的颜氏风教。他“衔酷茹恨，彻与心髓”

的，是他的父亲颜协的文稿二十卷“未得编次，便遭火荡尽”，致使“不传于世”[1] (P269)。

三、《颜氏家训》人文关怀的现代启示

通过剖析《颜氏家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家庭教育中，除了封建礼教严肃不苟的共性化面相，还有着温情脉脉、情理并茂、至真至深的人文化面相。这两者的有机融合，构成了真实而鲜活的中国传统家教。以《颜氏家训》为代表的中国主流的传统家教文化不是一段凝固的历史化石，它是一条流动的思想与情感的河流。

在社会高速发展，教育从观念到内容急需与时俱进的今天，面对日益繁复的社会背景，我们以应试教育为功利目标的学校教育，在物化倾向重荷下向空心化、概念化、教条化嬗变的家庭教育，完全可以从具有浓郁人性化、情感化色彩的《颜氏家训》中获得一点中国特色的人文关怀的启示，从而使我们在面对人、教育人、塑造人的百年工程中更富有人情味、人性化，更长于情感的、心灵的沟通与感召。

披沙拣金，《颜氏家训》的人文关怀有以下方面对当代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生命价值观。具体而言有以下三个启示点：一是珍爱生命。生命是人生唯一的财富，因此，保身是人生的首要之务。二是呵护生命。保身须通过养生来实现。三是舍生取义。为了行诚孝、履仁义等道德义务、社会原则以及全家、济国等团队利益的需要，生命是不足惜的。

(二)大学习观。我们进入了一个学习时代。创建学习型社会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颜氏家训》中所蕴涵的学习观，可资借鉴的主要内容有：1. 学习动因说。生存需要从业，从业需学习。2. 广度学习说。生存学习是学习的基本层次，但从人的生存目标、生活目标、发展目标以及社会目标的多种需要，从道德伦理、人生价值、文化传承以及个人素质等不同角度、多种价值取向出发，进行跨行业的甚至不问贵贱、广学博取的广度学习，是我们今天素质教育的需要。3. 终生学习说。《颜氏家训》所倡导的勿失时机的早教、幼学与“秉烛夜行”式的老而学观点，与现代终生学习的理念一脉相承。尤其对因种种原因失去了普通教育机会的中老人群，是一种极大的精神激励。4. 守志笃学说。《颜氏家训》提倡的不因贫而失学、因财而弃学的笃学精神，不仅对今天的贫困学子是一种极大的精神关怀，对望商海而羡渔的学人也是一种诚挚的人生警策。

(三)理智而开明的大人才观。大学习观的基础

上进一步产生大人才观。《颜氏家训》在广学的前提下对社会各阶层、各领域、各类型人才的肯定与兼容,对我们今天理智地确立子女成才的大视野以及现代社会开明的广人才观都是有所裨益的。

(四)情感与理性交织的家政观。现代社会的家政观念具有极大的情感性与随意性,而《颜氏家训》中所表现出的交织着血缘情感与理性价值的家政观对我们今天的家政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家庭教化不失时机、自幼而始;对子女殷切期待与严格要求,但要保持宽松心态、宽容心怀;身言结合,以身作则,注重尊长的垂范作用;家庭消费施而不奢、俭而不吝。

(五)营造家庭人文氛围。现代家庭教育基本上是建立在物质背景下的物质文化形态。升学目标、前程目标牵引着家庭教育,商品世界、虚拟世界极大地排斥着人文教育,造成当代家庭人文教育的淡化、弱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注重家庭人文氛围的《颜氏家训》传递出浓郁馨香的家庭人文教育的气息:世家文脉的传承以实现家庭成员人文传统的心理建构为目标;以安身立命、为人处世、生活品质为出发点传递人文精神,包括进取精神、文化旨趣、审美情操;在

明确而稳定的家庭伦理秩序中实施情感教育。

总而言之,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的转型时期。物质文明迅猛发展,多元文化八面来风,使我们的价值观,尤其是人文价值观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这种情形下,以《颜氏家训》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家训文化中所蕴涵的浓郁的人文关怀,是滋养现代国人人文素质的精神养料,可以使我们的青少年在中国式的人文关怀中,成长为走向世界的中国人。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具有深远意义的课题。

参考文献:

- [1] 王利器. 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 [2] 孙隆基.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3] 徐少锦, 陈延斌. 中国家训史[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3.
- [4] 丁钢. 历史与现实之间: 中国教育传统的理论探索[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2.
- [5] 孟宪承, 陈学恂, 张瑞璠, 周子美. 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 [Q].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1.

Human Morals and Modern Enlightenment of Yan's Remarks on Family Education

LI Peng-hui

(Pre-school Education College,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3, China)

Abstract: Yan's Remarks on Family Education is a piece of works like a milestone in our country's family education, not only combining family education and social lives, association facts with blood relations, using speech education and feelings with abundant contents systematic theories and standardized articles, but also containing dense, careful, profound human morals among serious moral heritage and old-respected expectation. In fast developing society, especially family education facing the present from concept to content, in our schools that aim at benefits according to examinations and family education which changes from heavy burdens to hollows, concepts and dogma they can be enlightened about China-special human, so that they are enriched with humanity and human feelings when facing, educating and encouraging human beings. Additionally, they will be better at emotional, soul communication and inspiration. If so, they will improve the youth's mental construction and even grow to become the modern Chinese people entering the world.

Key words: Yan's Remarks on Family Education; human morals; modern enlightenment